

公手相也

周翼南

我是个无神论者，也不相信天命。但对于看面相、手

相、却什

其因

新曰

以立三十

光宗耀祖

羽合

省下来

命先生说得基本正确：第一，以现在来看，一名专业作家，吃

手相

周翼南自选文集



过命。

又曰：

顺遂，

未存

福

子相

周翼南自选文集

一九九四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手相——周翼南自选文集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54-1124-x

I·967 定价：18.00 元

目 录

手 相	1
我的“自白”	4
我与画	8
往事三忆	12
妻 子	28
我家的猫	41
蝓蝓儿	52

西班牙母亲	57
乌龙湖边	68
第五个星期一	105
艺术大院轶事	126
猫 眼	126
门 卫	130
邻 居	135

白发在阳光下闪耀	
——记诗人曾卓	143
刃口上的生命	
——王振武祭	183
碧野老人和雪儿	264
冰心老人品画记	267
多病故人亲	
——写周代	270
画家们	274
徐松安	274
薛楚凤	276
聂千因	278
刘文谔	282
李世南	286
谢 申	293
谈沈从文的一次“发言”	298
忆与曾卓的一次“聊天”	301
砚子画狗记	304
 顶天楼读书记	 307
读《我与胡风》	307
读《孙犁文集》珍藏本	310
读《诗经辨义》	311
读《曾国藩》	314
题《雀巢集》	317
编书积德	319

谈买书	321
谈藏画	324
顶天楼画记	328
鸡年画鸡	328
妻画兰	329
《怡然自得图》记	331
自制贺年卡记	332
《陋室图》记	334
《面壁图》记	334
《王籍诗意图》记	335
“鬼城”记游	336
也谈东湖	341
“戒石铭”的启示	345
黄山九人行	347
《中国：亚当和夏娃》后记	436
《人物·山水·猫》后记	440
《秋菊集》序	442
《愚人船》序	446
画展前言	450
画展后话	451
《易难画集》前言	453
《画外谈画》后记	454

附 录	456
王 石：周翼南论	456
田 天：周翼南境界	461
於可训：见性情的文字	464
周韶华：读《易难画集》书后	465
邵大箴：得益不浅	467
周翼南创作年表	470

手 相

我是个无神论者，也不相信“天命”。但对于看面相、手相，却处在似信非信之间。

其因在于我呱呱坠地不久，祖父说请人为我算过命。断曰：将来我吃的是文界的饭，不会吃商界的饭。又曰：我在三十岁以前将历尽坎坷，三十岁以后则诸事顺遂，光宗耀祖。

算命先生将这段话写下来，我见过。只是未留存下来——“文革”时，怕惹祸，烧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算命先生说得基本正确：第一，我现在是一名专业作家，吃的确是“文界”的饭，至今未想过要“下海”；第二，三十岁以前确实倒霉：虽未赶上57年的“扩大化”，却遇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既饿过肚子，也当过“牛鬼蛇神”。现在虽非“诸事顺遂”，所作所为也对得起先人了。

80年代初，应邀赴广州参加《花城》笔会，赴会的文友中不少人是看手相的高手，有“北宗”“南宗”之分，此外还有来自河南的张一弓。一弓握着我的手，诚挚地望着我，诚挚地猜测我的过去和预测我的未来。像情人一般絮语。他说得是那么回事，难

怪他看手相哄动了中国作协。

几位看手相的高手均成为我的好友，故我得“北宗”、“中宗”及“南宗”之奥秘，自成一“宗”，可以随心所欲为人看手相。试了几次，很准。特别是我判定几位挺着大肚子的女同事准生儿子，后来果获“弄璋之喜”，使我名声大震。

作家张映泉不信，要我看手相。我观后言道：从手相看来，一、你家兄弟众多；二、你母亲的个性比你父亲强，家里的事是母亲说了算。

映泉听后吃了一惊。服了。

自成一“宗”之说，玩笑话而已。连我自己也不信什么手相。我看手相，凭的是直觉。玄乎一点说，可能是具有一点“特异功能”吧？

去年冬天，在深圳遇见美术评论家彭德，据说彭德会看手相，求他看相者众。我与彭德初次见面，亦笑而求之。彭德挺严肃地握着我的手，挺严肃地看着我的手纹，然后言道：

“你为人潇洒，在你一生中，各个时期都受到女性的青睐。”

说毕，他用疑问的眼神盯着我。我微笑道：“说吧，继续往下说。”

“你无意当官，”彭德盯着我继续说，“但你将来有可能当个不大不小的官。”

“还有吗？”我笑问。

“有。”彭德沉吟片刻，“你不享高寿，但你将寿终正寝，无疾而终。”

我问彭德“高寿”的标准。

彭德说：“八九十岁吧。”

“好。”我笑道，“用不着活到那岁数，免得患老年痴呆症。”

受女士青睐也好，当不大不小的官也好，都是次而又次的事。倒是彭德君判我不享高寿且无疾而终令我欣慰。我已年过半百，总

担心将来老了，病魔缠身，不仅自己痛苦，还拖累后人。彭德之言若得验证，真是件幸事了。

近日在书摊上购得一本《中国当代预测家》，所载者，皆能预测之奇人。故写此小文，留传后世，倘彭德君之言确凿，则可入“当代预测家”之列也。

1993年春·花桥

我的“自白”

活了半个世纪，忽有人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便不知如何回答。

我们这代作家，没有引以为荣的革命经历。5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有一点倒可视为骄傲：我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那时有“常识”课，老师介绍苏联老大哥的成就，说苏联工厂一分钟造一辆汽车，我听着，眼睛直眨，觉得不可思议，想来想去想不明白。那时，也决不可能想到，50年后，苏联的旗帜在众目睽睽下降落并有了“独联体”。

我的兴趣不在“常识”上。我喜欢胡涂乱抹。照说，我应该成为一名画家。是鲁迅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因为那时我还喜欢读书，读童话故事，没钱买，便去书店——有丰子恺作插图的《格林童话全集》便是站在书店里读完的。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商店的营业员，他喜欢书法，但从不为我买书。进入初中以后，从邻居家看到一本《鲁迅小说集》，便借来看，忽然觉得进入了一个真正的令我感动的世界：祥林嫂、阿Q、孔乙

己……都似曾相识。还有迅哥儿和他的“隐鼠”。通过鲁迅，我又认识了“五四”以来的一批作家，我喜欢巴金和沈从文，还有知名度不很高的、带着淡淡忧郁的鲁彦。

当我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面进一步开拓，我认识了我所能认识的知名外国作家，那时我最喜欢的作家乃是美国的杰克·伦敦和俄国的屠格涅夫。

80年代初，我以编辑的身份访问巴金老人，我对他说：“谢谢您。”

巴金老人问：“谢什么？”

我说：“您以优美的文笔翻译了很多屠格涅夫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懂得了应该尊重女性。”

巴金老人微笑了。

每个作家都不能自行选择他出生的地域和所处的时代，他只能受到生育他土地的滋养，并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上下求索。我生于1941年，这个年份就大致决定了我今后的经历。少年的我不很理解中国文坛在1955年的那场劫难，我却在1957年开始尝试创作。在这之前，我写过“诗”——徐志摩式和殷夫式的诗，也模仿过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现在想来幼稚，而在当时，是真挚而严肃的。

1957年，我读高中二年级。学校里揪出了一批“右派教师”，墙壁上贴着他们的“罪状”，一个学生控诉了自己如何受到这些“右派”的“毒害”。我便借此素材，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篇小说，投寄《中国青年报》，不多时，得到回信，对小说作了肯定但云要修改。我不知从何改起，于是乎这次“创作”便流产了。这篇小说如果发表了，今后道路或许不一样，但决不是什么好事。至少会感到内疚。

中国政治动荡渗入中国每个作家的血液里。是好是坏难说，或可用老子的“祸福观”视之。

大学时，我写过一篇中学生参加“扫文盲”的小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发表在校刊上。第一次得到微薄的稿费，用这笔稿费多喝了几碗飘着几点油星和葱花的萝卜汤——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这是街上常见的可充饥的食品。

尽管饥肠辘辘，从不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一切灾难系“修正主义”所为。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是单纯。

我成了一名教师以后开始写电影剧本，我想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搬上银幕，先写了《杜甫传》和《辛弃疾》。居然引起武汉市文联当时领导人的重视，甚至准备把我调到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灾难，因为突然不允许写“死人、古人”。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剧本便成了“借古讽今”的“反对三面红旗”的“毒草”，使我倒霉了许多年。

或可以说，我真正开始创作是在1977年。其时，我已经三十六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有以上的经历，我才写了一些作品，出了几本书，成了一名作家。不是什么“高级作家”，只是一名很普通的作家。

前些日子，一友人告诉我，在南方一些富裕的地方，父母如此责骂不用心读书的子女：“你要是不好好读书，学不到本事，将来就只能当干部！”

我笑道，骂得不对，应该把“干部”换为“作家”。

“作家”这一行，才真正是不能发财的行当。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不过对于真正的作家说来，存款一千和存款一万乃至百万，并无差别。存款多，未必是好事。有语曰：“文穷而后工”，没有“文富而后工”之说。好的作品，常出自于作家清贫奋斗的阶段。而财富往往使人堕落变质异化。

中国同外国不同处之一，就是把著文当作仕途之道，而在当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又只能为“政治”服务。昔之传统和近之弊端，便造成今天中国作家队伍心态的芜杂。倘有了

“名”、赚了钱且当了官，有些“作家”便露出贪婪霸道的原形。严格地说，这种人不是作家。

作家是什么呢？这问题可以有一千种回答。我以为，作家就是用笔来倾诉心灵感受的人，他的倾诉可以提高人们对世界、对生活、对自己的认识。金钱、权力应该与作家无缘。作家或可得到名望——这“名望”乃是后世藉其作品作出的评价。作家只是写作，大可不必考虑这些身外之事。

以上这些，均是一位“知天命”的作家的“自白”吧。

1993年春于武汉花桥

我 与 画

会画画，是一种天赋。不过，要成为一名画家，甚至名上画史，那就要看机缘造化了。

小时候没有做过当画家的梦。回想起来，我迷上画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叛的结果。那时，父亲常逼着我写毛笔字，我厌烦颜体排体，于是，坐在高高的凳子上便忿忿地涂抹起来，画人、画房子、画船，还画了些莫名其妙的玩意。根据新潮评论家曰：艺术，乃情感之宣泄也。我那时虽不懂艺术为何物，但胡涂乱抹一阵，不满借此发泄一通，心中便好受一些。当然，要被打手心，或罚跪。结果是适得其反的——使得我至今写不好毛笔字，而且迷上了画画。

过程就不必细说了，画过皮影人头、摹过小人书，直到读初中一年级才上了“正道”，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家中藏有一本《芥子园画谱》，我拿在手里，一边翻阅，一边吸冷气，仿佛看的是一本天书。我借回“天书”，废寝忘食地依样画葫芦临了几十幅，自我感觉良好，良好得初中毕业后投考湖北美术专科学校，居然破关斩将，通过了素描、写生、创作等关隘，一榜赫然题名，只须通

过口试便可进入绘画的艺术殿堂了。

由于一个字——一个别字——断送了我的绘画前程。

一排考官坐在桌后问我：你喜欢哪些画家？

我说了一些，有齐白石，有徐悲鸿等等，我不知怎么那时很喜欢黄胄的线条流畅的速写，毫无必要加了一句：“我还喜欢黄胄的速写。”

一位考官皱着眉头说：“不是黄胄，是黄胃。”

我很固执，毫不动摇地说：“我喜欢黄胃，不是黄胃。”

考官们皆皱眉。这样，发第二榜时便找不到自己的大名。

我大概有一种乐观的天性，这落榜并未能使我垂头丧气须得投江跳河。未必非得在绘画这棵树上吊死不可。除了“黄胃”，我还喜欢鲁迅、闻一多、屠格涅夫和杰克·伦敦的。我便远离美术转入文学。众所周知，这条路更不易走。在我当教书匠时写过两个历史剧本，因此，一旦要“革”文化的“命”，我便成为牛鬼蛇神，受到关禁批斗。

那儿时的反叛心理再次涌起，我讨厌写交待材料。我写的交待材料从未受到肯定赞扬，轻者斥之“不老实”，重者便押到学校操场中心进行批斗。忿忿之余便又开始画画了，画什么呢？画记忆里《芥子园画谱》中的山水，把材料纸裁如书签大小，用钢笔画，用火柴梗缠上棉絮蘸水皴擦点染，当然只能偷偷地画，画完后塞进被褥下边。不幸被看守发现，数百幅佳作毁于一旦，只有数十幅藏在红宝书红塑料壳里的山水得以幸存——后来，我贴成一本，送给患难与共的妻子。我在自己装订的画册的扉页上题了一首诗：

“九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这是鲁迅赠许广平的诗，我擅改一字：“十”改为“九”，因为那时我同妻子结婚只有九年。

在那“十年”里，主要在后期，我认识了几位老画家，常有往来。看他们作画，在那时，对我是赏心悦目的乐事，目染之余，也买了笔墨纸砚，在家中又涂抹起来——这，自然也是一种发泄，只是比儿时画得有模有样一点罢了。

要不是中国出现了第二个“十月”，我可能就这么画下去。文坛开禁后，我又转向爬格子，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不知怎么竟荣获作家的称号。甚至出了几本书，当然不是惊世之作。孩子们也大了，我也从父亲升至“爷爷辈”，虽自觉还未入老境，病痛却增多，前几年便患了坐骨神经痛，这主要是成天坐着读书著文所致，医嘱每天必须站两个小时。为健康故，既不能如傻子般站着，又无耐心学太极拳练鹤翔桩。灵机一动：何不站着作画呢？这样，便又开始画画了。

反正，因站着作画，病因此而愈。而且，在友人的范围内有了点名气，报刊上也发表了几幅业余水平的画作。因为我是“文人”，甚至有位朋友称我的画是正宗的“文人画”。还有人建议我应写申请加入市美协省美协中国美协。

我一笑置之。人生有限，现在当作家已属勉强，何能入画家之列？我只觉得画画对健康有益罢了。我画画，常是坐久了，站起来挥挥毫，犹如做体操，犹如练气功。对着白白的宣纸，常不知画什么好，动笔之后便随心所欲，画山水、人物、猫和花卉。同画家们相比，我仅有这么一点优势：没企望笔下会有佳作故无心理负担。也很少有什么条条框框能限制我——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考虑出世入世这派那派，亦不考虑继承创新发展突破。我求人刻了两方印：一是“毁誉由人”，一是“随心所欲”。

画画对我是一种活动，一种调剂。画了，友人索要，慨然予之，友人高兴，我也高兴，皆大欢喜。

友人建议道：何不办画展？出画册？这建议确使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但又想，遵言为之挺累人，还兴师动众。办了，出了，